

邹容 陈天华评传

冯祖贻

河南教育
出版社



近代史人物评传

邹容陈天华评传

冯祖貽

内 容 提 要

邹容、陈天华是近代史上两位年轻的爱国英杰。作者以详尽的史料，较为系统而深入地评述了二人的一生，充分肯定其在风雨如磐的年代，从爱国到革命，披肝沥胆的英勇献身精神；运用比较研究对二人思想的异同作了深刻分析；同时，对史学界的歧异之处，客观地介绍了不同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书后附有邹容、陈天华生平大事年表。

近代史人物评传

邹容 陈天华评传

冯祖贻

责任编辑 郭运庆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河南省商丘报社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1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2次印刷

印数：3,341—5,195册

ISBN7-5347-0845-1/K·33

定 价： 1.95元



邹容像



陈天华像

序 言

章开源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读过不少辛亥革命时期仁人志士的诗文。其中许多披肝沥胆之言，至今犹令人在讽诵之余感受到心灵的震撼。

“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颖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强国，地球上之主人翁，不可不革命。革命哉！革命哉！我同胞中，老年、中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真有善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这是邹容在《革命军》绪论中的恳挚呼唤。

“那怕他，枪如林，炮如雨下；那怕他，将又广，兵又精强；那怕他，专制政，层层束缚；那怕他，天罗网，处处高张。猛睡狮，梦中醒，闻天怒吼；百兽惊，龙蛇走，魑魅逃藏。改条药，复故辙，完全独立；雪仇耻，驱外族，复我冠裳。到那时，齐

156/24-7

叫道，中华万岁！才是我，大国民，气吐眉扬。”这是陈天华在《猛回头》结语中的壮烈誓言。

这些都是血泪写成的文字，是一代革命先驱生命光焰的记录，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品格的结晶。这些文字作者的思想和业绩，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激励人们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就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也可以不断鞭策我们以旺盛的工作热情和丰硕的劳动成果奉献给祖国母亲。我常想为这些年轻的仁人志士立传，但苦于行政事务忙碌而无暇执笔。现在，冯祖貽同志撰写的《邹容陈天华评传》经由河南教育出版社刊行问世了，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邹陈合传，理所当然。尽管一个生在四川，一个生在湖南，家庭背景、经历和性格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具有爱国民主思想，都用至诚的文字为革命鼓吹，而且都过早地死于英年，牺牲在革命正在进入高潮之际，因此特别使人们深感钦佩而又惋惜。邹容和陈天华都是有崇高理想、远大抱负和才华过人的英俊青年。他们又各有自己的性格，陈天华的湖南“霸蛮”精神和邹容的巴蜀清奇气质，使他们的短促生命散发出浓郁的乡土气息。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为这一代仁人志士写传，如果有一大批好的传记，则将可为

今天的青年提供一座有立体感的、虎虎有生气的辛亥革命时期年轻英杰的群像。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今天的青年，必将踏着先驱者的足迹，继承革命先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在祖国大地上建成前所未有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共同奋斗！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一、风雨如磐的年代	(1)
二、从爱国到革命	(16)
三、邹容的《革命军》	(34)
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	(56)
五、邹容与《苏报》案	(77)
六、陈天华在同盟会成立前后	(93)
七、壮烈捐躯	(121)
八、“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143)
附录：邹容、陈天华生平大事年表	(153)
后记	(161)

一、风雨如磐的年代

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席卷着神州大地。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思潮冲击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反动面目进一步暴露，它们的统治更加摇摇欲坠了；保皇派的陈词烂调变得黯然失色，不得不偃旗息鼓，走下台来。反之，资产阶级革命的正义却大为伸张，左右了当时的思想政治舞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无数青年志士正是从革命的宣传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前途，投身于革命事业；革命的宣传也帮助了一度被清政府假立宪欺骗的人，走上与封建统治决裂的道路。资产阶级的革命宣传，为本阶级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可以这样说，没有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也就没有伟大的辛亥革命。

在这一场蕴育着时代风雷的革命宣传洪流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其中，以两位年青人尤为突出，他们虽然过早地为恶势力夺去了生命，但是他们的火一般的革命热情和耀眼的思想光芒，吸引并激励了整整一代人。这两人，一个便是以写《革命军》著称于世的“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另一个是以写《猛回头》、《警世钟》为人们熟知的陈天华。

邹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原名桂文，又名绍陶、威丹（或作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市）人。他出身于一个富商家庭，其父邹子璠“以贩鬻致富”^①，行商于沪、汉、陇、蜀之间，在重庆开了一个名叫“利川升”的商号。邹容的家庭生活虽然富裕，但商人在封建社会地位却是低下的，封建统治者“贬之曰末务，卑之曰市井，贱之曰市侩。”阶级出身的烙印，使邹容有着改变中国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潜意识。

陈天华（一八七五——一九〇五）原名显宿，字星台，号思黄，又号过庭，湖南新化县人。其父陈善是个乡村塾师，家境贫寒，陈天华少时曾“废学营小卖自给以求学”^②。农村贫苦的生活，使他亲身体验了广大劳动人民备受压迫欺凌及清朝官吏的横暴贪婪。湖南又是太平天国革命经过的地区，不平的社会使少年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革命深为景仰，“少时即以光复汉族为念”^③。邹容、陈天华虽然出生地点不同，家庭状况也有差别，但是在清末这个动荡的社会中，他们都产生了要改变这个社会，改变本阶级地位的要求。

陈天华、邹容的少年时代，中国已一步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难深渊，整个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都十分尖锐。

陈天华比邹容早出生十年。在陈天华出生的那一年，英

①章炳麟：《邹容传》，见《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上册，第353页。

②杨源禧：《陈君天华行状》，新化自治会1907年刊本。

③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9页。

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赴云南迎接英国“探险队”搞侵略活动，被当地群众杀死，英国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无理要求。次年（一八七六年），清政府命李鸿章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烟台条约》。一八八一年，俄国以交换伊犁城为条件，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向清政府索取了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中国领土，并取得通商、免税等条件。一八八四年法国又悍然发动中法战争，中国军民英勇地战胜了法国侵略者，但在清政府卖国投降方针指导下，次年仍与法国签订了屈辱的条约，这一年正是邹容诞生的一年。以后，一八九四年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又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腐朽的清政府在战争中一败涂地，不得不与日本签订了极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除大量赔款之外，还将辽东半岛（后赎回）、台湾、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一九〇〇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英、美、日、俄、德、法、意、奥等八国组成联军，联合进攻中国，中国又遭到一场浩劫。清政府在侵略者面前摇尾乞怜，对中国主权又来了一次空前大拍卖，与侵略者签订了《辛丑条约》，光赔款一项，本息共计达九亿八千多万两，相当于清政府十二年的财政总收入。《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在上谕中竟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

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便纷纷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中国。中国除割地、赔款外，它们还在中国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当时出版的一张“形势图”清楚地勾画了中国已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瓜分的惨痛情景：沙俄象一只凶狠的北极熊鲸吞着长

城以北地区；英国象一只恶狗盘踞着长江流域；法国如癞蛤蟆将爪子伸向云南、两广；德国则用一个腊肠将山东紧紧圈住；日本的侵略黑线通过台湾伸向福建；如饿鹰似的美国从菲律宾扑向中国。

在邹容、陈天华的家乡四川、湖南，帝国主义势力的深入同样给人以痛苦的记忆。

四川处于中国内地，物产丰饶，向有“天府之国”称号。帝国主义早就看上了这块肥肉。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了英国可沿长江由宜昌上驶重庆，在重庆居住、开设行栈，这就为外国殖民主义者进入四川打开了大门。一八八二年英国便在重庆开设了领事馆，第二年，英国夺取了重庆海关权。一八九五年，通过《中日马关条约》，帝国主义各国又获得在重庆开设工厂的权利，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纷纷进入四川，其中尤以日本后来居上。一八九六年日本在重庆设立领事馆，一九〇一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日本又在重庆抢夺土地，设立了日租界，从此四川的门户向各帝国主义敞开，长江中外国轮船横冲直撞，各地丰富的铁、金、煤、石油资源为各帝国主义夺取。他们为了掠夺四川价廉质优的资源，倾销商品，从一八九一到一九一一年间，先后在四川设立各种洋行、公司达三十五个之多，洋货不仅在重庆等沿江城市泛滥，而且深入全省各地。

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也深入四川。据一九〇七年统计，“自省会以迄县治，教堂几遍”^①，教徒达五十万。外国传

^①《四川》第一号，1908年1月。

教士在四川各地包揽诉讼，勾结官府，并以宗教为名进行各种间谍活动，劳动人民正是从传教士身上，更痛切地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压榨之苦。

为支付赔款、外债及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腐朽的清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剥削。在四川，清末各种新、旧税额和田赋附加已超过正额二十倍，其他杂税已达“一鸡一猫入城，莫不有捐”^①的地步。奎俊督川，“见农民入城担粪，即抽粪税，每担取数文，每厠月取数百文。税至于粪，真无微不至”。^②毫无疑问，一切的田赋正额、附加及捐税最终将落到贫苦的农民和城市居民身上。清末四川，政府腐败，水利失修，一遇天灾，便出现流离死亡的惨象。在邹容离蜀后一年（一九〇二年），四川旱灾波及七、八十州县，“每处饥民至少以五千计，已有数十万之多。”^③其中蓬溪县，出现了“或男或女相守僵于牖下，或骨肉并命惨填沟壑，或将尽之喘卖及妻儿以图一饱，或一家之长，先杀其属后乃自裁”^④这样惨绝人寰的景象。

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四川各地尤其是帝国主义势力最集中的重庆附近人民，勇敢地开展了斗争。一八六三年，重庆群众打毁法国天主堂，是为四川反洋

①秦枋：《蜀辛》卷下，第2页。

②《民报》增刊《天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第311页。

③《高给谏奏牍》，《恳请新督岑春煊迅速赴川折》。

④《蓬溪县志》卷十一，《匪灾》。

教斗争之始。一八六四年重庆又爆发第二次反教会斗争，由重庆地区影响到四川各地，酿成著名的大足余栋臣领导的反帝起义。一九〇一年，义和团成员进入四川，组织红灯教在四川大规模起事，这一年六月，红灯教首先在重庆附近贴出“灭清、剿洋、兴汉”揭帖，号召群众烧教堂，打官府。到一九〇二年，红灯教起义发展到高峰，全川有三十多个府县响应。

在陈天华的家乡湖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同样给人以刻骨铭心的印象。

一八九九年，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威胁清政府，开辟岳州为商埠，并在城陵矶设海关。这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湖南建立的第一个侵略基地。一九〇四年，长沙也正式开为商埠，接着湘潭、常德又被开为寄港地。从此各帝国主义国家商品长驱直入湖南各地，湘江中行驶着英、美、日各国轮船，长沙太平门外洋行林立，帝国主义的吸血管吮吸着湖南群众的鲜血。

湖南丰富的矿产资源更是帝国主义争夺的对象。至一九〇三年底，“洋商收买之湘矿已达七、八千余契”^①，“全省矿利几乎拱手让人。”^②除矿产外，帝国主义在湖南开始了筑路权的掠夺。一八九八年美国合兴公司与清政府订立兴建粤汉铁路合同，一九〇〇年又续订合同。美帝国主义通过

①)《湖南之矿业》第32页，转见《辛亥革命在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湖南官报》第466号，同上。

借款便攫夺了横贯湖南、勾通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大动脉，不仅激起了湖南人民的激烈反对，也引起其他帝国主义的覬觐。

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在湖南也是极为严重的。当时湖南不仅有法、德、意等国建立的天主教堂，而且有英、美建立的耶稣教堂。仅天主教在衡州一地即建有各种会所、公堂、修道院等宗教机构一百二十余所，府属七县，只有酃县未设教堂外，其余各县都有教堂。

湖南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的剥削最突出的表现是土地兼并的严重。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以曾国藩、曾国荃为首的湘军头目通过各种手段掠夺了大量财富，于是回乡大肆兼并土地。仅曾国荃一人即占田六千亩，曾国藩半之，其他如郭松龄在湘潭置田宅值十多万金，这些将帅，“田宅之外，如票号、如当店以及各项之豪买豪卖，无不设法垄断”，使贫民生计全断，不得已“流为会匪者，几于十居五六。”^①

清末湖南群众斗争此起彼伏，连续不断。较大规模的有一九〇〇年爆发的衡州反洋教斗争，一九〇二年爆发的辰州反洋教斗争，同年在邵阳爆发的贺金声领导的“大汉灭洋军”，声势更为浩大，有二十万人参加。

邹容、陈天华的少年时代，正是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下度过的。祖国山河惨遭帝国主义蹂躏、践踏，祖国的父老兄弟在帝国主义及清朝封建统治下

^①李祖：《上王荃石中丞书》，《宝丰斋类稿》，卷83。

痛苦呻吟的情景，不能不给他们留下终身难忘的印象，祖国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自己家乡父老的命运时时萦怀在他们心头。正是这一切，曾激发了当时一代的热血青年去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邹容、陈天华也是由此出发，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探索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奇怪，在《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著述中，他们用了那么多篇幅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和清政府的罪行，又用了那么多篇幅如泣似诉地描述了祖国人民所受的种种苦难。

然而，在邹容、陈天华这一代青年志士身上激起思想火花的，开始时还不是什么新思想，而是传统的民族主义。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在中国，特别是汉族的思想遗产中，有着丰富的民族意识的东西，经过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等的提倡与宣传，更深入人心。邹容和陈天华早年就深受其熏染。

邹容六岁便发蒙读书，十二岁时已读完“四书”、“五经”、《史记》、《汉书》等书籍，少年时的邹容喜欢阅读名人传记，历史上爱国的民族英雄事迹尤使他倾倒。他最崇敬的是明末清初的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他视夏完淳为楷模，并时常背诵夏的一些悲壮感人诗文以激励自己。

同样，陈天华少年时代也特别爱读历史书籍，九岁时读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85页。

完《左传》，因家境贫寒，买不起书，常向别人借书阅读，象《三国演义》、《水浒传》乃至民间唱本，他都爱不释手。这些阐述民族大义、赞颂农民起义的作品，在少年陈天华心中播下嫉恶如仇的种子，据闻他“遇乡人之称颂胡、曾、左、彭功业者，辄唾弃不顾而有愧色。”^①他鄙视被清朝政府誉为“中兴伟人”实际是刽子手的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将他们视为湖南人的败类，人民的罪人。他胸怀大志，曾在墙上题字：“莫谓草庐无豪杰，须知山泽起英雄。”^②表达了他对“山泽英雄”的向往。二十一岁时，陈天华随父到新化县居住，仍做小贩谋生。后得资江书院院长邹苏柏赏识，允许他入院求学并在书院借阅藏书，陈天华遂将书院中一部二十四史“整日整夜细心研读”，“每读书至奸佞乱朝，夷狄猾夏，制度废弛之所由”^③，常常掩卷长叹。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知早年的陈天华虽有忧国忧民的抱负，但由于只是从中国史籍与小说中吸取养料，所以还只是在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中打圈子。

但是，时代在前进，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十九世纪末，维新思潮在全国兴起。维新人士从西方引进了“新学”，广泛传播了君主立宪的改革观念，开始冲破了专制主义牢笼，改良派的政治思想和实践在当时思想界起了启蒙作用。湖南和四川都是维新思潮在内地比较活跃的省

①冯自由：《〈猛回头〉作者陈天华》，《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19页。

②杨源藩：《陈君天华行状》，新化自治会1907年刊。

③罗元鲲：《陈天华的青少年时期》，《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